

研究論文

「共生」與「契洽」：城市中產家庭婆媳 合作育兒的媒介實踐

安利利、李美儀

摘要

數字媒介正日漸成為深度參與婆媳合作育兒的重要中介，形塑著現代新型婆媳倫理關係與家庭權力格局。本研究以「共生」和「契洽」這對社會學概念為理論分析框架，運用扎根理論分析方法，旨在探討數字媒介在婆媳合作育兒實踐的過程中如何發揮「流動的」階段性作用。研究發現，在合作育兒初期，數字媒介激發與擴大婆媳雙方在數字身份構建、育兒知識獲取、認知與運用、育兒消費理念與行為等方面的代溝，並由此生發出網際空間的權力對抗和線下衝突格局，形成功能互補的「共生」張力。隨著合作育兒進程的發展，數字媒介逐漸成為緩和代際關係，促進婆媳代際觀念協商與調和的重要因素，催生了家庭共同體的強化與權力結構的調整，完成了代際間「契洽」關係的建構。現代代際合作育兒的圖景正在被媒介影響與書寫。

關鍵詞：數字媒介、婆媳合作育兒、城市中產家庭

安利利(通訊作者)，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助理研究員、博士。研究興趣：文化傳播、代際傳播、家庭社會學。電郵：1029310437@qq.com

李美儀，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碩士。研究興趣：教育社會學、媒介素養。電郵：li.meiyi@fox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2年1月31日。論文接受日期：2022年8月3日。

Research Article

Symbiosis and Consensus: Media Practice of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Cooperative Parenting in Urban Middle-Class Families

Lili AN, Meiyi LI

Abstract

Digital media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deeply involved in the cooperative parenting of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which is shaping a modern new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 family power structure. With the help of the sociological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symbiosis and consensu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digital media play a staged role in the process of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cooperative parenting practices.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early days of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cooperative parenting, digital media activated and expanded the generation ga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dentity, the acquisition, cogn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arenting knowledge, and the concept and behavior of parenting consumption. The conflict pattern forms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complementary fun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rol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parenting process, digital media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as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promoting the negoti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of

Lili AN (Assistant Researcher, corresponding author).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family sociology.

Meiyi LI (M.A.).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media literacy.

Symbiosis and Consensus

intergenerational concepts of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construction. The picture of modern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ve parenting is being shaped and constructed by the media.

Keywords: digital media, cooperative parenting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urban middle class famil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An, L., & Li, M. (2023). Symbiosis and consensus: Media practice of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cooperative parenting in urban middle-class familie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4, 129–159.

研究動機與目的

婆媳是當代中國家庭的重要育兒主體。傳統婆媳關係是媳婦以「非血緣」外人身份進入以父子關係為主軸的家庭，並與掌握「主內」權威的婆婆之間不平等的權力互動關係。社會轉型過程中，在現代女性意識覺醒、代際平等觀念強化及年輕女性全面職業化的影響下，家庭中第三代孩童的降生促使祖代背井離鄉、遠赴子代生活的城市照顧孫代，婆媳因育兒需求開始共同生活，基本形成以子代為核心的「臨時主幹家庭」格局。對於日漸壯大的城市中產階層而言，「重心下移」的兒童養育越來越成為家庭關注的焦點，媳婦的「外人」身份和婆婆的「主內」身份隨著兒童價值變遷、家庭結構調整及代際合作育兒進程推進出現了現代性的結構調整。

「代」作為一種生物、文化現象伴隨人類永久存在。Prensky (2001) 將伴隨著電腦、電子遊戲、手機等數字設備成長的一代稱為數字原住民 (digital natives)，將不是出生在數字時代、而且會被拿來與數字原住民相比的人稱為數字移民 (digital immigrants)。以80、90後為主的媳婦多伴隨中國互聯網的崛起成長，深諳「網道」，熟稔數字媒介使用技能。以50、60後為主的婆婆則是典型的數字移民，她們的媒介使用能力明顯不足。兩代人在數字媒介認知和使用上的代際鴻溝影響著她們的共同育兒過程，數字媒介成為深度參與合作育兒過程、構築婆媳合作育兒情景、形塑當代新型婆媳倫理關係的重要張力所在。

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存在隔代撫育的國家 (劉嘉煒, 2018)，加之數字媒介時代導致代際問題更趨複雜，這直接令中國家庭中婆媳間的倫理關係更具特殊性、微妙性與多元性。因此，本研究意在探討社會轉型下的城市婆媳合作育兒現狀與倫理關係變遷，嘗試以「共生」(symbiosis) 與「契洽」(consensus) 這對社會學概念解析婆媳在代際合作中的關係流動以及數字媒介對其的影響，總結代際雙方在合作育兒過程中的協商模式，為數字媒介參與下處理婆媳關係、解決代際衝突提供新的解決思路。

文獻綜述

理論基礎

不管是從已有文獻的學術研究視角還是從日常生活的實踐觀察來看，婆媳合作育兒關係充滿張力，現代數字媒介的深度介入更為雙方的關係建構增加了不確定性，婆媳既是權力爭奪者又是利益共同體，構成衝突與調和的共存關係。

當下流變的家庭及家庭代際關係的新變化給傳統的家庭理論帶來挑戰，祖輩和孫輩在代際關係中的自主性增強，使得以中間一代為主導的傳統理論的解釋力下降（吳帆、尹新瑞，2020）。本研究認為，充滿複雜性和多樣性的代際關係總體呈現為「傳統」與「現代」，「矛盾」與「和諧」的辯證統一關係。本文以「共生」與「契洽」這對社會學學術概念為基本分析框架，從建構視角對數字媒介參與城市家庭婆媳倫理關係塑造和演變進行探究，並嘗試描摹基於數字媒介參與的中國婆媳代際合作育兒的動態模式。生物學意義上的「共生」概念為De Bary (1879) 提出，指不同的生物共同生活 (living together)，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現象，雙方會因對方的生存而得到利益。社會學研究者們在探究人類社會與群體時引入這一概念，不同物種群落共同生活可以適當地稱為社會共生 (Park & Burgess, 1921)，是一種成員間承諾完成相同或互補的行為和合作關係。而有別於動物的人類社會具有高度的延續性，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並非蚜蟲與螞蟻之間互利互惠的關係，而是能夠達成一種「契洽」關係，此時個體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成全別人，是「比合作或共同行動更為突出地表現了人類的特徵」(Park & Burgess, 1921)。費孝通 (1998) 將這一概念引入對親子代際關係的描述之中，他認為親子關係經歷著從「共生」到「契洽」的發展過程。這對概念有助於解釋本研究所關注到的數字媒介參與下婆媳合作育兒的動態性演變過程，成為分析在媒介參與下婆媳關係建構、發展過程的重要理論依託。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過去的相關文獻

育兒是家庭社會學研究者關注的重要議題。代際合作育兒主要指家庭中的祖輩與父輩共同撫育孫輩的過程，是當下眾多家庭的主要育兒形式。目前，學界對於城市家庭合作育兒主要聚焦以下三方面。

第一，合作育兒的類型、分工與權力格局。在當代中產家庭呈「密集型育兒」(intensive parenting) 特徵的背景下，為了實現階層優勢代際傳遞，女性成為高度參與教養子代和高度經濟、情感投入的主體(段岩娜，2021)。有學者將家庭女性合作育兒劃分為協商式、主導式、退讓式和對抗式四種類型(張楊波，2018)。從整體家庭權力結構調整視角看，年長者權力削弱已是不爭事實(沈奕斐，2009)，「嚴母慈祖」的分工和權力格局在家庭內部形成，母親成為育兒「總管」，掌握主導孩子成長的話語權和決策權，祖輩以「幫忙者」角色進入子女家庭並承擔大量兒童生理性撫育和家庭照料工作，促使其在家庭權力關係中的主導權威下降(沈奕斐，2009)。

第二，合作育兒中的代溝與衝突。代際間基於生物性因素和歷史發展、社會變革所產生的行為方式、生活態度、價值觀念方面的差異、對立、衝突被稱為「代溝」(generation gap) (李新華，1989)。媳婦的「科學育兒」理念與祖輩掌握的傳統育兒經驗形成強烈對比並成為引發代際衝突的重要隱患(張楊波，2018)。雙方在育兒方式(穿著、飲食等)(張蘋、胡琪，2016)；教養目標和養育策略(邢淑芬等，2012)；知識體系、教育理念和社會角色(張杰，2015)；管教方式(樂麗雲，2009)；科學育兒知識學習的態度和行為、關注的知識內容等(李興睿、馮劍俠，2019)多方面存在差異並易引發矛盾。育兒科學話語的轉變使老人的經驗在「操作層面」與當下的實際需求產生了一定背離，與現代育兒期待的衝突造成其經驗在「符號意義」上出現貶值(肖索未，2014)。「老漂族」的祖輩面臨著跨越階層的現代育兒規範以及脫離原有生存與社交空間的現實和情感雙重困境(李一，2018)。也有學者從積極視角指出，雖然代溝使得代際間存在一定育兒差異，但父輩對祖輩的育兒知識的代際文化反哺對增進代際間育兒觀的溝通、減少育兒觀差異、推動代際合作育兒良性互動有積極作用(李興睿、馮劍俠，2019)。

第三，代際合作育兒給家庭倫理關係、家庭結構形態等帶來變革與挑戰。血緣關係成員的增加是家庭結構短期內變動的重要原因，在形態上具有「臨時性」特徵(姚俊，2012)。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現代社會，傳統家庭倫理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家庭代際撫養合作關係格局從「嚴父慈母弱祖」轉向「嚴母慈祖弱父」且女性權力出現異化(李碩，2019)。在父系家庭和工業社會變遷的理論框架下，代際權力關係開始向子代傾斜，老人在承擔家務以及帶孩子的同時，還要承受子女並不感恩所帶來的失落與焦慮，而子代則多受惠(陶艷蘭，2011)。男性缺位的「喪偶式育兒」強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操心者」角色，給女性帶來母職困境與性別焦慮並促成了家庭內部不平等的性別關係(李芳英，2019；徐依婷，2020)。家庭倫理本位下，老人人生的價值感與圓滿感、老人主動構建的親密關係、社會輿論等是促發代際合作育兒成為可能的重要因素。在家庭情感化轉向下，代際合作育兒出現了母系支持突顯的現象(汪永濤，2020)。

儘管當前的研究對家庭代際合作育兒及其倫理關係的現狀、困境、新挑戰等話題進行了探討，但依然缺乏從媒介視角深度探究家庭代際合作育兒的學術成果，對於「數字媒介如何影響合作育兒」、「數字媒介時代婆媳關係如何演變」等問題尚未明晰。已有研究多從批判的角度展現了當代婆媳倫理關係的靜態性現狀，似乎預設在後喻文化時代，家庭倫理關係呈現出「衝突」大於「和諧」的樣態，忽視了媒介參與、婆媳倫理關係動態調整等微觀建構過程。不能忽略的現實是，數字化深度介入家庭生活無疑會對代際合作育兒的理念、方式等帶來利弊共存的影響，複雜的婆媳關係及權力結構正在被數字媒介重新參與協調和定義。

研究問題

鑒於此，本研究主要關注城市家庭場域中數字媒介在婆媳合作育兒過程中的角色、作用及行為背後隱匿的婆媳間代溝與衝突、協商與合作，以日常生活中的數字媒介實踐作為分析取向(自國天然，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2019)，探究數字媒介如何介入家庭代際合作育兒，如何作用並助力婆媳雙方實現知識互換、媒介賦權及影響婆媳倫理關係建構。具體包括：

1. 當代中國城市家庭婆媳合作育兒初期，數字媒介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婆媳兩代女性是如何基於自身的代際屬性來認知和使用數字媒介？現狀如何、張力何在？
2. 數字媒介在育兒實踐的參與基礎上如何進一步影響和再塑婆媳倫理關係？婆媳雙方建立了何種觀念體系、情感連接、權力格局？

這將有利於勾勒並反思中國社會轉型期城市家庭代際合作育兒的媒介實踐，對於探究家庭場域文化交往現狀和城市新型婆媳關係倫理構建有重要社會現實意義。

研究設計

研究對象

選取城市中產階層家庭的婆婆和媳婦為研究對象。中產階層 (middle class) 是工業化和市場化的產物，主要指「生活水準、財產地位處於中等層次的社會群體」(李強，2001：17)，在國內尚無標準定義。在為中產階層劃分標準時應綜合考慮職業、收入和教育等多元指標(李春玲，2013)。研究選擇了對經濟社會地位影響較大的三個客觀指標作為「中產階層家庭」的取樣標準，即收入水準(人均收入平均線至平均線2.5倍之間的人群)、職業類別(子代是各種領取薪金的、具有一定管理許可權或技術水準的非體力勞動者)和教育資本(子代取得了中專和大學本科階段及以上教育文憑)。選取城市中產階層家庭作為研究對象，首先是因為現代育兒理念包裹在「科學育兒」概念之下，在城市社會的年輕父母——尤其是受過良好教育、收入穩定的新興中產階層——中得到推廣和流行(肖索未，2014)，即城市家庭中婆媳的數字媒介使用更加頻繁、受中產階級消費文化影響更深、對「科學育兒」理念追求更高。另一方面，「母職、照料與教育」是我國當代中產階級研究的重要

視角之一(馬丹丹, 2018), 當代城市中產階層家庭日常生活折射了碎片化的經濟現實與結構化社會變革中我國家庭倫理關係的變革和文化交往的演變。

研究成員對來自城市家庭的10對婆媳進行了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深度訪談, 受訪者必須同時滿足城市家庭且收入符合中產階層基本要求, 以及婆媳共同居住進行合作育兒, 並在育兒過程中有數字媒介深度參與的基本條件。訪談者信息見表一。研究具體利用熟人網路、滾雪球的「目的性抽樣」方式獲得能夠為本研究提供最大信息量的典型樣本, 直到收集到的資訊達到理論飽和(陳向明, 2000)。依據研究倫理, 本文對個人資料進行了匿名處理。

表一 訪談對象基本情況

序號	化名	年齡	學歷	戶口所在地	職業	月收入 (萬元)	孩子情況
第一組	小舒	39歲	博士	北京	教師	3.20	女, 4歲
	小舒婆婆	64歲	中專	吉林長春	中醫醫生(退休)	0.60	
第二組	醒姐	33歲	碩士	湖北武漢	私企人事主管	3.00	男, 3歲4個月
	醒姐婆婆	59歲	高中	遼寧瀋陽	自由職業	暫無	
第三組	小芸	35歲	博士	雲南昆明	公務員	1.40	男, 1歲
	小芸婆婆	64歲	本科	雲南昆明	醫院會計(退休)	0.70	
第四組	蘭姐	35歲	本科	北京	自主創業	3.50	女, 1歲4個月
	蘭姐婆婆	64歲	大專	北京	交通事業單位(退休)	1.80	
第五組	梅姐	33歲	大專	天津	證券從業者	4.00	男, 3歲6個月
	梅姐婆婆	58歲	中專	天津	私營老總(退休)	暫無	
第六組	燕燕	32歲	碩士	河北保定	教師	1.60	女, 10個月
	燕燕婆婆	59歲	高中	黑龍江哈爾濱	酒店職工(退休)	0.40	
第七組	婕婕	33歲	碩士	河南安陽	教師	1.20	男, 5歲3個月 女, 3歲1個月
	婕婕婆婆	61歲	初中	河南南陽	乘務員(退休)	0.50	
第八組	晶晶	36歲	碩士	新疆烏魯木齊	媒體從業者	2.60	男, 4歲6個月
	晶晶婆婆	61歲	本科	河南鄭州	公務員(退休)	1.80	
第九組	玲玲	35歲	碩士	安徽合肥	漢語外教	3.20	女, 2歲
	玲玲婆婆	64歲	高中	安徽合肥	自主創業(退休)	暫無	
第十組	霞霞	37歲	博士	山東淄博	研究員	1.90	男, 5歲4個月 男, 1歲1個月
	霞霞婆婆	69歲	初中	山東聊城	自由職業	暫無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研究方法

研究採用質的研究方法，深描和勾勒數字媒介視域下城市家庭的婆媳合作育兒圖景。質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訪談、觀察、實物分析)，對研究現象進行深入的整體性探究，從原始資料中形成結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陳向明，2001)。質的研究方法有助於更好地展現婆媳在育兒實踐中的媒介參與過程，更好地解釋媒介使用行為背後的婆媳倫理關係建構及其背後的原因。

結合預訪談編制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提綱，大致涉及以下問題：一、**媒介使用與兒童撫育**。具體包括「你是從甚麼時候開始關注媒介上的育兒資訊？都涉及到育兒的哪些方面？」、「你相信媒介上的育兒內容嗎？如何辨別真假？你認為你的辨別能力如何？」、「你的育兒知識是如何生成的？主要通過哪些媒介管道獲得育兒資訊？最經常使用的是哪個？為甚麼？」等六個問題。二、**媒介使用與代際交往**。此部分針對婆婆和媳婦進行題目的差異化處理，對媳婦提問包括「從媒介上學習到的育兒內容糾正了你已有的哪些育兒誤區？舉例說說。這個誤區與你婆婆的育兒行為存在關聯嗎？」、「媒介上習得的育兒知識是如何投射到現實育兒實踐之中的？你們兩代人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怎樣的矛盾衝突，又是如何面對、溝通與達成意見的？」等七個問題；對婆婆的提問包括「據您的了解，兒媳婦會通過媒介關注育兒資訊嗎？她主要通過哪些媒介管道了解？態度如何？是否會與您分享？是否主動教過您相關的操作？」、「您覺得媒介對您或者是祖輩傳統習得的育兒行為產生了怎樣的壓力？您又是怎麼認知這種壓力的？您為之作出了怎樣的轉變？」等九個問題。

研究採用以一對一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為主、參與式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為輔的方式完成資料收集工作。為保障訪談內容的真實性和有效性，每個受訪者單獨接受訪談，訪談時間在兩小時左右。選用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作為質性資料的分析方法，強調行為與互動對知識建構的影響作用，主張從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主體間的互動關係角度入手，以開放式編碼、關聯式編碼、核心式編碼逐級歸納的方法，從

反映社會現象的經驗材料中創造出解釋性理論，以更好更深入地對錯綜複雜的現實世界完成認知。兩名研究者運用類屬分析 (categorization) 和情境分析 (contextualization) 相結合的方法策略對資料進行分析和解釋研究，以期獲得受訪者的數字媒介參與育兒實踐的發生、發展以及影響全過程。

表二 三級編碼過程

開放式編碼	關聯式編碼	主軸編碼
數字育兒知識的獲取、認知與運用；數字育兒消費理念；數字社交網路在育兒中的運用	數字代溝	數字代溝與數字衝突是婆媳合作育兒初期的重要「共生」關係特點
科學育兒觀念與傳統育兒觀念的對抗；數字共用空間的隱性權力對抗	數字衝突	
數字育兒觀念反哺；傳統育兒觀念哺育；母職觀念	價值觀念調和	價值觀念調和與代際協商機制確立是媒介參與促進婆媳關係「契洽」的重要走向
育兒分工；家庭育兒格局；家庭共同體	代際協商機制確立	

「共生」：數字媒介參與下的婆媳育兒代溝與衝突

組成「臨時主幹家庭」共同照顧三代孩童標誌著婆媳「共生」關係的正式確立。婆媳相互依賴，保持行動目的和利益訴求的一致性，共同努力給三代提供良好的生存保障、促進其健康成長。合作育兒初期，雙方雖因共同的家庭功能和利益訴求完成「共生」關係的確立，但往往需經歷較長磨合過程，在此期間，以手機、電腦為終端的數字媒介深度參與，為合作育兒提供了知識、消費、社交關係等重要內容，為家庭成員的共同育兒活動提供了交流的虛擬公共空間，也使雙方在育兒知識、價值觀念等方面的代溝與衝突進一步彰顯，潛移默化地形塑著家庭的文化形態與倫理關係，使得「共生」關係中充滿了張力。

數字代溝：婆媳在育兒實踐中的差異化使用偏好

代際間對新技術、新媒體的學習、適應及甄別能力的差異被稱為「數字代溝」(周裕瓊, 2014)。社會的快速變革與資訊技術的飛速發展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導致婆媳兩代人的數字代溝不可迴避，同一「媒介」在共同的育兒目標下發揮著不同作用，為婆媳「共生」關係提供了先天的對抗性「基因」。

婆媳都希望運用數字媒介輔助完成育兒任務，但雙方在育兒知識獲取與運用上呈現明顯的數字代溝。其一，關注的育兒內容各有側重，婆婆最關注日常養育類知識，媳婦則關注與育兒有關的各類內容，種類更加多元。「二次上崗」進入子代家庭的婆婆往往承擔起照顧孫代生活起居的重擔，涉及日間照料、家務勞動等工作，最為關注孫代的身體健康和飲食安全等生理性問題。「我就擱網上看，孩子多大啦，該吃甚麼啦，增加輔食啦，或者營養方面該吃甚麼」(小舒婆婆)。而伴隨著育兒工作的專業化、精細化發展，遵從育兒專家的指導、做學習型父母逐漸成為中產階層親輩認同的教養策略(陶艷蘭、風笑天，2016)。學習和發展好母職角色成為媳婦的主要任務，她們作為新時代「母親」在數字媒介上的議題關注更為廣泛、多元，肩負著更高的育兒期望，對資訊、知識、論壇交流、電商消費等有廣泛需求。其二，婆媳對數字媒介平台的選擇差異較大，婆婆使用最多的是綜合資訊類媒介平台、搜尋引擎(如今日頭條、騰訊新聞、百度等)及傳統電視媒介；媳婦則更偏向於專業育兒、線上醫療、教育以及微信、抖音等新媒體平台。已有量化研究顯示，祖輩的育兒資訊來源六至八成集中在自己和同輩的育兒經驗，晚輩告知為三成，手機互聯網只佔兩成且平台資源較為單一(李興睿、馮劍俠，2019)。現代育兒理念對婆婆提出諸多新要求，「迫使」她們捲入現代科學育兒的浪潮。而「科學育兒」是與數字媒介高度綁定的，她們必須自我調整，主動走近「科學育兒」。「孩子比如說有啥問題，我就開始從哪方面查。比如她這一段時間有睡眠問題，總愛醒或者總一驚，我就去網上查一下，看甚麼原因」(小舒婆婆)。源於對傳統媒介的信賴，電視媒介是婆婆偏愛的知識信源。媳婦則能夠充分運用自我的媒介挖掘和探索能力，分階段、分類型、有側重的選擇專業應用程式，滿足不同的育兒需求，如在手機中專門建置一個資料夾來放置各類育兒APP。對於有著豐富育兒APP運營經驗的蘭姐來講，她會首要通過互聯網媒介中的紙媒電子資訊以及官方醫學期刊、指南獲取孕產、育兒知識，因為這樣的內容更完整更權威。

婆媳共同完成育兒消費職責，但在媒介消費理念與行為上具有明顯代溝。婆婆往往偏好線下給孩子購買衣物等日用品，追求性價比，不追求甚至不了解品牌；媳婦更偏好通過網路購置各類育兒用品，追求品牌品質，塑造並突顯中產階層的文化品位。經歷不同社會物質發展時期的婆媳往往持有不同的消費價值觀念。有的婆婆不會網購，將給孩子購置物資的權力完全交由媳婦掌控；有的婆婆喜歡使用拼多多等軟體給孩子購買便宜實惠的用品。「她(婆婆)買的很廉價，品質不好，老買一些山寨的三無品牌」(小舒)。有些婆婆即便會網購也認為線下購物「看得見、摸得著」，更令人放心。媳婦深受消費主義思潮和中產階層消費觀念影響，被建議消費特定的商品和服務以更好地滿足孩子的需要，這甚至成為當代科學育兒知識生產的發展趨勢(陶艷蘭，2018)。孕產、生育、早教等商品裹挾出現在各類母嬰媒介知識平台中，被精準投放到即將或剛剛成為母親的女性群體，暗喻「科學育兒」思想需要良好優質的消費產品為依託，進而促進育兒消費。媳婦充分發揮自己網路購物「才幹」，執著於追逐奶粉、尿不濕、奶瓶等品牌產品，通過「有品質」的消費行為獲得對育兒的保障、完成「母職」身份的自我形塑與身份認同。再有，婆媳在醫療消費理念上有很大差異。當孩子生病時，婆婆們普遍希望通過傳統經驗的「土方」來緩解病症，其次才是就醫。一方面是出於「前輩的」自信，認為孩子病症程度在可控範圍內，另一方面認為只有「生大病」才會去醫院，「畢竟醫院不乾淨，最好不要隨便去」(醒姐婆婆)。「如果是危及到孩子健康，我誰都不信，只信醫院。我覺得第一個是因為現在養孩子都精細，第二個肯定受到媒介潛移默化的影響。在老人的經驗和媒介資訊產生衝突的時候，我只聽醫生的」(梅姐)。媳婦則往往有強烈的就醫意向，這種心態不僅是因為少子化使得每個家庭都將孩子視為「掌上明珠」，還受到媒介資訊傳遞的深刻影響，比如每條關於育兒醫療的資訊最後都會強調「具體情況建議到醫院找專業醫生進行諮詢」。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數字衝突：育兒觀念和育兒權力的角逐

儘管婆媳有著同樣的育兒目標，但認知、媒介素養及價值取向差異的數字代溝深刻作用於合作育兒實踐過程並呈階段性動態演變趨勢，「共生」關係往往暗藏危機，婆媳育兒合作在初始階段多停留在照料行為上的互補，在觀念、情感等方面呈現出「表面和諧、實際衝突」的撕裂現實。

第一層面，現代與傳統的育兒觀念對抗。數字原住民的媳婦天然地更親近數字媒介，而作為數字移民的婆婆則相對缺乏主動探索、傳播和生產育兒知識的技能。媳婦易於在合作育兒開始前就先入為主地站在婆婆傳統育兒觀念的對立面，對婆婆傳統帶孩子經驗呈現排斥和抵觸心理，將新思想與老經驗對立視之。這促使媳婦努力通過數字媒介獲取「科學育兒」的現代知識與理論參照，利用網路加持獲得話語權，以對抗傳統育兒理念。「網上關於婆婆帶孩子的搞笑或負面資訊看多了，我心裡就先種下了一顆種子，覺得婆婆跟我有點像對立的關係」(燕燕)。梅姐在談及教育孩子過程中婆媳觀念上的差異時，也認為數字媒介能為她「幫上忙」。可見，數字媒介促使媳婦自覺被現代「科學育兒」話語形塑，並實現賦權。在育兒初始階段，婆婆普遍以自身傳承的育兒經驗來應對媳婦的「零經驗」理論式育兒並自以為傲。「比如沖奶粉，以前就是自己配比、自己沖。現在買奶粉裡面配勺子，有嚴格的奶和水的配比要求。我覺得有點刻板、太教條了！……反正我是按照我的方法來」(燕燕婆婆)。但在「科學育兒」的理念要求下，婆婆經常遭遇「滑鐵盧」，她們的傳統育兒經驗在迅猛的社會變遷和數字媒介的深入滲透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傳喻危機，文化傳承的「落空」和精細餵養的壓力給婆婆帶來很大心理落差。「我們以前帶孩子都是問老人、朋友。主要的模式我覺得是一種傳承，就是上一輩怎麼帶的，你就怎麼帶」(燕燕婆婆)。由此可見，數字媒介無疑是製造或擴大代際育兒觀念衝突的重要因素，使得婆媳「共生」關係充滿了隱憂。

第二層面，數字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婆媳加持育兒立場的有效「武器」，在虛擬共用空間完成隱性權力的對抗與爭奪。網路給育兒知識的共用提供了新的空間與可能，婆媳在家庭微信群中通過相互轉發

符合自身育兒理念的文字、視頻類資訊，以隱性方式完成自我育兒觀念表達。媳婦擅長利用網路意見領袖為自己「代言」、加持話語權威，同時紓解面對面溝通的衝突強度。比如燕燕認為微信群給她提供了「敢於發聲」的視窗，她會對婆婆「錯誤的」育兒行為進行針對性的內容分享，並配以俏皮可愛的表情，既完成觀點輸出又保全婆婆「面子」。婆婆也會積極從媒介和社交網路中獲取支援自己育兒經驗的內容對媳婦進行有效「反擊」，強調傳統育兒經驗的現代適用性。「最近孩子便秘，她會覺得她是學中醫的，認為是內火之類的，還會發一些相關的連結來支撐，讓我無法辯駁」（小舒）。但是，媒介平台選擇的偏好差異和媒介素養差距使雙方在認知對方的「科普」內容時呈現不同的接受態度。婆婆多表示媳婦發來的內容具有很高可信度，而媳婦則認為婆婆分享的內容多源於「山寨」公號，可信度不高。「她每天往群裡轉發來自於一些莫名其妙的公眾號還有甚麼今日頭條之類的各種非權威育兒資訊。這種我是肯定不會看啦！……有些是要用來印證她的觀點的」（小舒）。雙方通過線上數字媒介場域完成了育兒理念的堅守和育兒權力的捍衛，建構了一種合作與競爭熔鑄的「數字共生」關係。

數字社交：在育兒參與中的不同角色

數字身份可被視為獨一無二地描述一個主體 (subject) 或實體 (entity) 的資料，是有關一個人的所有在數字上可得資訊的總和 (Kinderlerer et al., 2012)。數字社交網路參與了育兒全過程，形塑了婆媳獨一無二的數字身份和差異化的社會定位，使得「共生」關係出現更大張力。婆媳雙方均依賴數字社交圈層助力自身育兒實踐，並在社交互動中形成或維持了自己的育兒文化身份，但二者的區別在於，媳婦借助數字社交不斷完成育兒圈層的構建與拓展，形塑了相對穩定、高度趨同的「中產母親」這一數字身份；婆婆則以數字為媒聯絡舊有社交，喚醒或堅守育兒傳統與理念，延展線下的傳統祖輩身份，其流動性和可變性較低。

媳婦對以育兒為核心的社交網路需求很高，是趨同效應下構建自身育兒實踐體系、建立較強情感和信任連接的重要社會支援系統。「因為小霞比我生得早，很多都是來自於她的經驗，也會自己去學一些，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像看看育學營的APP。還有輔導班的話也是朋友介紹」(小舒)；「現在這種微信群很多的，去醫院檢查也會給你推薦這種孕媽的群聊」(玲玲)。媳婦大多加入過「孕媽群/寶媽群/親子群」，社交媒體成為年輕媽媽們分享日常、交流經驗的重要場域，並完成從線下到線上的交往場域拓展。「我在孕期的時候加了很多群，有孕媽媽群，還有和同事的交流。因為我懷孕是在疫情期間，大家見面比較少，在微信上和同事們聊的比較多，她們會給我推薦一些孕期能夠用的產品和微信公眾號」(燕燕)。數字媒介說明她們進入育兒趣緣「圈子」，在孕、產、教等不同時期加入不同的群組圈層，完成資訊分享、情感交流、價值傳遞以及組團消費等社群行為，獲取不同階段的育兒資訊儲備、經驗知識分享及情感價值支持，更使其不斷強化對「中產母親」的個體母職身份和共同體圈層認同。

「老漂族」婆婆的人際交往關係隨著身體的遷移被打破。這一群體往往承擔著雙重的母職照料責任，承受著身體的勞累，面臨原有照料經驗與現代科學及中產階層育兒話語的拉扯(卜娜娜、衛小將，2020)。她們很少主動拓展新的育兒社交圈，原有的社會強連接關係被迫轉化為線上弱連接，與同齡的朋友、同事相互交流隔代撫養的經驗、問題並獲得背井離鄉下的社交關係鞏固與情感慰藉，這體現出婆婆在社會融入方面存在困難(劉亞娜，2016)。很多婆婆都強調為了帶孩子放棄了自己原有社交圈子和興趣愛好，全身心投入到孩子的「吃喝拉撒」，線上交流育兒想法成為她們與老友保持情感聯結、舒緩焦慮與孤單的重要途徑，也成為她們「抗衡」媳婦育兒理念的助力方式。「我也有朋友的微信，有時候會和她們在微信上交流現在的這種育兒方式，有問題會問問她們。一個是諮詢問題，一個是溝通情感」(燕燕婆婆)。舊有同輩社交圈層給婆媳育兒的「共生」關係融合帶來一定阻礙。

「契洽」：數字媒介參與下的婆媳觀念調和與協商機制確立

「傳統」和「現代」是家庭現代化理論的核心範疇，發展的家庭現代化理論修正了兩者之間對立、非此即彼的關係，認為兩者之間還存在

融合與互補的關係(馬春華等, 2011)。對數字媒介參與婆媳合作育兒的研究恰恰印證了「傳統」與「現代」的融合之路。發達的數字媒介不僅成為構築代溝、引發衝突的重要因素,同時也為兩代人提供了知識、理念、價值流動與互通的管道。隨著合作進程的推進,婆媳在育兒觀念、婆媳關係和家庭育兒權力格局上從「共生」走向「契洽」,數字媒介發揮著重要的黏合作用。

數字反哺與文化哺育促進育兒觀念走向「契洽」

年輕世代在數字接入、使用和素養上對年長世代的教輔行為被稱為數字反哺(周裕瓊、丁海瓊, 2020),且已成為代際文化傳播新常態。受集體化時代影響而脫離出的中國社會一代會在國家各項政策改變和市場經濟浪潮的雙重作用下進一步發現和改造著自我(石金群, 2016),婆婆一代往往具有敏銳的自我察覺意識,承認自己在數字素養、育兒理念方面的落伍,從而「欣然接受」媳婦的數字技能與育兒理念反哺,如晶晶婆婆表示:「現在網路對育兒影響很大,我對她們的觀念欣然接受。兒媳會辨別媒介上的各種資訊,分享一些視頻,我都會看」。婆婆對媳婦的媒介推介很是信任,並已將數字反哺視為一種習慣,比如對「把尿」、「搖睡」行為的主動放棄、對精細製作輔食、接入早教的主動追求等都是對自身傳統育兒經驗的修正。當然,婆婆們大多經歷了從抗拒、觀望、抉擇到接受的過程,不斷協調「傳統」的「現代化」轉向。已有研究多將祖輩定位為現代媒介生活和臨時主幹家庭中的雙重弱者,本研究發現城市媳婦對婆婆參與合作育兒和使用數字媒介的評價普遍較高,認為「我的婆婆和別人不一樣」。「我婆婆比很多同齡老人更前衛,更願意學習」(醒姐)。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數字移民」正在成長轉變,老年人的媒介素養正在逐漸提升。數字反哺行為體現的是媳婦主動的孝親、顯親的孝道踐行和尋求育兒情感和理念的共識意願,婆婆感受到的是強烈的技能支持和情感陪伴,雙方的距離得以拉近、育兒理念得以傳遞,反哺程度越深的家庭,親子關係也會和諧(周裕瓊, 2014),代際育兒觀念正向著緊密的「契洽」方向發展。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文化傳遞是雙向互動過程，自上而下的代際承繼是文化傳播的首要特徵(陳滔、卿石松，2019)。一個社會的延續性和生命力取決於它能否成功地將其風俗習慣、技術和理想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儘管數字媒介所宣揚的「科學育兒」理念對媳婦帶來重要影響，但隨著育兒進程的發展，婆婆傳習的育兒經驗給媳婦帶來很多「驚喜」，有效地幫助媳婦在「現代育兒」和「傳統育兒」之間理性選擇，形成穩定的養育價值理念。如燕燕在育兒初期對婆婆的經驗式育兒提出懷疑甚至拒絕，後來聽取了婆婆的育兒建議而收穫了良好效果，摘掉「有色眼鏡」，嚐到了「土方真香」。「我家寶寶出生的時候耳朵稍微有點變形，我婆婆說以她的經驗可以多給孩子揪一揪。我通過新媒介去查，發現是不可能的……看醫生說沒必要做機械矯正，建議接受不完美的耳形。我最後只能將信將疑地去揪，然後奇跡是真的揪好了」(燕燕)。訪談中也有個別媳婦表現出對傳統育兒觀念的絕對否認，「他們(祖輩)的經驗都已經過時了，現在沒人按照那種方式去帶孩子」(婕婕)。但整體而言，絕大部分媳婦能夠在育兒實踐中實現數字經驗和傳統經驗的互補認知和應用。婆婆育兒理念的哺育與傳承正是代際文化傳遞過程的縮影，婆婆將自己的積累和經驗「傾囊相贈」，是一種倫理和情感的主動傳襲，媳婦在不斷的判斷、選擇和接受過程中完成文化傳承，雙方在動態互動中進行文化對話，向著更為親密的關係方向發展。

協商共用促進婆媳實現從家庭功能的合作、共生轉向倫理情感的契洽、共融。在婆媳合作初期，雙方必須面對觀念差異所導致的矛盾與衝突。隨著合作育兒進程的推進，媳婦對數字媒介中宣揚的科學育兒思想逐漸從全盤接受到靈活調整；婆婆也在對數字媒介育兒資訊的頻繁接觸中逐漸接受科學育兒理念，數字媒介的參與確實促進了代際育兒觀念的「靠近」，給合作育兒帶來積極影響。「我婆婆自從參與育兒後，在今日頭條上經常刷育兒資訊，媒介說明我們相互靠近」(燕燕)；「原來光聽孩子們說還是將信將疑，因為我帶孩子都帶過來了……但是通過看媒體的文章發現媳婦說的沒錯，比如孩子得有一套自己的餐具，不要跟大人混著，因為病從口而入……」(梅姐婆婆)。已有研究多強調隔代教養的消極影響，認為隔代教育的幼兒一些力所能及的勞

作時常由祖輩庖代，會影響兒童能動性的培養(趙光偉，2004)，容易出現焦灼和恐慌、應變遲緩、行為怪癖和專注力分散(林志忠，2002)等問題，祖輩的「經驗育孫觀」和父輩的「現代育兒觀」的矛盾分歧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合作育兒的效果(俞峰，2021)。本研究呈現出合作育兒的積極面向——數字媒介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婆媳雙方革新教育觀念、樹立科學兒童觀，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宣揚知識理性和熔鑄觀念共識的穩定作用，提供了構建文化溝通場域和新型權力關係的可能。婆媳雙方還因媒介建構了共同話題，根據孩子的特點與需求不斷調整合作關係，生成個性化育兒行動方略。

數字互動促成婆媳以共同「母職」為基礎的情感契洽

首先，數字媒介拓寬了婆媳互動場域，生成了緩衝矛盾的新機制，有利於「契洽」情感關係的形成。數字媒體改變了原有傳統大眾媒介的傳播情境，出現了新舊資訊場景的融合(何志武、吳瑤，2015)。婆婆會在媳婦懷孕時期主動關注孕期和育兒資訊並分享給媳婦，滲透高度情感關注，利於雙方在虛擬場域提前完成關係確立，為線下親密關係建立打好基礎。數字媒介還打通了線上線下話題的討論空間，促進了更為融洽、平等的溝通交流，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文化區隔，促進婆媳在媒介互動中確立育兒主體性，增強身份認同。「如果婆媳可能會存在不同見解的話，媒介就相當於是一個第三方的經驗可供參考，就更容易達成共識。它在消除矛盾或者更新育兒觀念或者這種親密關係方面，有很多積極的引導作用」(醒姐)。同時，線上線下議題的融合延展了合作育兒的討論機制，加強了主體之間的行動和情感連結，婆媳間的利益和訴求常通過媒介不斷傳達與協調，媒介合作育兒作為家庭互動的重要一環，成為婆媳情感交流的重要載體，也促進代際關係從側重於傳統孝道規範下的社會交換向強調親子內在關係的情感滿足轉變。

其次，數字中介性互動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雙方對母職的同情共感。「母職」(motherhood)一般指女性在性別社會規範框架下，在承擔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人類繁衍任務時所產生的對「母親」這一社會角色的擔當與認同(卜娜娜、衛小將, 2020)。媒介的育兒框架成為婆媳建立共同話題和經驗互助機制的視窗, 雙方在媒介資訊的互動中深化母職體驗, 比如婆婆能理解媳婦的「雞娃」心態。「母親」這一共同身份使得兩個女人超越婆媳倫理關係, 深化為兩個母親之間的對話與共情。霞霞婆婆談到:「我們都當媽了。我覺得霞霞也越來越成熟了。我自己帶孩子的時候比較強勢……現在我覺得霞霞也能理解我當時的一些做法, 知道我那時候為甚麼會這樣, 因為作為母親處理事物的角度是不一樣的」。過去幾十年來, 中國經歷的巨大社會和人口變遷改變了家庭所處的宏觀環境, 給傳統的家庭代際關係帶來新的內容(馬春華等, 2011), 孩子不僅成為家庭成員當下的情感焦點, 其成長還被視為關乎未來代際階層流動的前景。新一代城市家庭的母親往往身兼數職, 母職的「經紀人化」(楊可, 2018)、教育「拼媽」(金一虹、楊笛, 2015)等議題使得母親群體面臨教育焦慮, 而數字媒介無疑加重了母職焦慮, 醒姐婆婆認為媒介給媳婦帶來的育兒壓力非常大:「對於現在的新媽媽、新爸爸, 那種傳統育兒已經pass掉了, 她們(媳婦)要不斷應對各種比拼」。由此觀之, 母親的生命體驗不斷被現代科學技術與消費主義所形塑, 祖輩在物質和精神空間同時參與育兒過程, 有助於促進代際女性的理解。

再有, 數字媒介的參與促進了現代平等婆媳觀的建構。婆媳這一非血緣關係的情感基礎較為薄弱(毛新青, 2008), 以「兒子」為中介建立的關係充滿著「爭奪」意味, 家庭第三代的出生在某種程度上又給這一關係增加了不穩定性。傳統家庭婆媳倫理關係反映的是婆婆為上、媳婦在下的女性等級制度, 強調的是婆婆對媳婦的引導與規訓, 媳婦要恭謹事奉公婆並遵從他們的絕對權力(劉彩玲, 2006)。隨著社會文化變革與家庭結構變遷, 傳統婆媳權力關係的固化差異被打破, 與親子關係的平等化發展方向一致, 強調雙方的平等與相互尊重。與此同時, 婆媳因文化、個性、經濟利益(劉彩玲、李桂梅, 2005)以及媳婦對「子宮家庭」(uterine family)的入侵而導致的矛盾表現得明顯而強烈, 實質上反映的是權力調整過程中的關係動盪。而數字媒介的有效介入潛移默化地調節著婆婆與媳婦的育兒觀念, 雙方在頻繁的數字媒介互

動過程中感受到的是平等溝通的力量，數字媒介在本質上完成了對雙方的同時賦權，推動了婆媳關係的現代性轉化，映射的是現代家庭倫理關係的調整與超越。

媒介賦權助推形成穩定的家庭育兒權力格局

一方面，數字媒介助推以媳婦主導、婆婆為輔的「台前幕後」界限分明的育兒權力格局的形成。代際關係是外部結構與自我主體性之間不斷博弈和協商的結果（石金群，2016）。數字媒介同時作為外在的結構性因素和個體的主觀行動性因素協調了婆媳在育兒關係中的角色定位。

兒童養育已成為社會競爭和階層再生產的標誌性開端，中產階層家庭對兒童養教的關注度和投入度不斷加大，傳統的性別意識形態、職場規則及科學育兒知識等方面的影響推動城市女性被規訓於「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陳蒙，2018）的認同與實踐話語體系之中。所謂「密集母職」是指在觀念上人們認為母親是孩子最好最理想的照顧者，因此母親應該以孩子身心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全心全意照顧孩子，甚至放棄個人利益（金一虹、楊笛，2015），很多女性在數字媒介的定義和規範作用下不斷強化對母職的認知與認同（陳蒙，2018），不斷推動媳婦加大對育兒的經濟、時間、智力及情感投入，並不斷與媒體話語中的理想母親形象、專家育兒理念等進行比照（Chae, 2015），以成為「好媽媽」的母職期待來嚴格要求自己，這就決定了媳婦必然成為育兒的權力主導者、政策制定者和實踐指揮者，婆婆轉到「幕後」，成為育兒的邊緣者和輔助者。媳婦偏重對孩子進行智識培養和性格訓練，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媳婦管教者的主導權力也越發「明顯」和「沉重」。婆婆在育兒實踐中注重無微不至的生理照料並擔任媳婦育兒思想的執行者，處在相對邊緣的位置，展現盡可能大的包容度，期待通過無私付出和權力讓渡得到子女的尊重和關心（肖索未，2014），側面反映出中國老年人潛意識中的情感依賴和身心歸屬需求（姚俊，2012）。媳婦負責篩選、判斷和傳遞來源於媒介的「科學育兒」知識與理念，負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責網購、線上教育等，婆婆負責接收和執行來自媳婦的育兒政策，結合自身育兒經驗完成日常照料工作。明確的分工和有效的配合催生了基於相互信任的媳婦主導、婆婆協助的育兒權力關聯式結構，推動了婆媳從家庭分工上的「共生」關係向倫理上的「契洽」關係轉變，構築著和諧女性家庭關係。

另一方面，數字媒介助推共商型家庭共同體的形成。數字媒介構築出不同於傳統線下倫理關係的新型關聯式結構場域，高頻的媒介互動行為有效加快趨於平等化的「臨時主幹家庭」共同體的建構。雙方在合作育兒前見面相對較少，「共生」關係的確立使得每個人的角色、心態、生活節奏都發生了變化，核心家庭的夫妻關係讓位於以孩童為核心的代際關係，在微信群裡分享孩子的照片、學習成果等成長印記或用育兒APP製作關於寶寶成長的視頻、相冊並在家庭聚會上播放分享等富有儀式感的數字形式有效強化了家庭共同體的概念，強化代際情感互動。「我們都會在群裡分享孩子的視頻，公婆分享今天怎麼帶了孩子，我分享知識性連結，分享之後可能會引發線下討論」(燕燕)。線上平等溝通關係的確立有利於調和推進黨下權力位置關係的調整，促進平等秩序的形成。再有，雖然現代男性在家庭育兒的觀念和行動中仍然相對缺位，但數字媒介在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家庭男性參與育兒的身份認同感和自我投入度。「我老公經常刷抖音，他會看到就是說孩子應該經常跟爸爸在一起，爸爸養出來的孩子是怎麼樣的……他會被這些媒介資訊所影響，然後會願意更多的參與育兒」(小芸)。所有成員都能以參與育兒為起點開啟媒介互動，鞏固了「三代同堂」的家庭共同體情感結構，削弱了成員間的差序等級，在本質上完成了對家庭倫理格局和倫理秩序的現代化重建。

隨著育兒進程推進，數字媒介為雙方育兒觀念調和、價值理念熔鑄，以及共同體觀念強化提供了良好的中介機制作用，為婆媳雙方實現觀念上的「推己及人」和「自我的擴大」提供契機，特別是在共同母職的情感互動共鳴下，二者關係有機會向著費孝通(1998)所言的最「理想」的親子「契洽」關係推進，即子方對於親方最初是一種生理的聯繫，接著是「共生」，最後才發生「契洽」的聯繫。媳婦對婆婆由「順從」向「尊重」演化，婆婆對媳婦由「絕對權威」到「獨立平等」轉換，雙方形成從

基於撫養三代的共同目的的「共生」到基於相互「利他」的親密關係的轉化。這種「利他」體現在育兒行動上的讓步、犧牲和育兒理念的妥協與成全，進而達成目的與權力的共用，完成了互惠性孝道代際關係的確立（袁佳黎、劉飛、張文宏，2022）。

結語

社會的轉型與變遷必然帶來社會最小單位——家庭——的轉型與變遷。中國城市家庭在經濟迅猛發展、社會文化深刻變革的背景之下出現了小型化（汪建華，2019）、核心化、老年空巢化（張翼，2012）等變化，傳統家庭倫理文化正在向新型現代家庭倫理轉化，而媒介在婆媳合作育兒實踐中的參與無疑彰顯和加速了這一轉化過程。

本文將數字媒介視為兼具宏觀結構性和微觀主體性的中介因素，以「共生」和「契洽」為理論框架探究婆媳在合作育兒過程中，如何通過數字媒介完成從合作到融洽的策略和動力機制，擴大了研究代際關係的社會與傳播學視野，拓寬了對代際關係現象的解釋力。「共生」與「契洽」是對數字媒介參與下現代婆媳合作育兒關係的動態性呈現，雙方的角色與關係呈「流動性」，經歷了從「共生」到「契洽」的發展過程。此視角既有效展現了「共生」關係中的代溝與衝突，也體現了不斷熔鑄的價值觀念與權力機制的「契洽」。數字媒介實現了從製造、強化衝突到緩和矛盾、熔鑄「契洽」，發揮著「彈性穩定」的槓桿作用，實現代際優勢育兒資源互補，構築現代科學育兒的合作框架，完成不同世代的教養實踐發展。數字媒介對孝道文化習俗影響下所形成的具有絕對權威的婆婆和單向服從的媳婦這種權力結構產生一定衝擊，推動構建了更為平等的婆媳倫理關係。而借助數字媒介構築的婆媳育兒溝通協商機制和共建家庭的合作關係，幫助雙方在平等合作關係基礎上建立起「各司其職」的工作模式，新型的婆媳育兒關係開始以合作為起點、以平等互助為主要形式得以重新構建。

對當代城市家庭代際關係的實證討論也有助於探究數字化對家庭倫理格局調整的影響。在數字媒介時代，技術、社會和生活加速（羅薩〔Rosa〕，2017）無疑使得當下流變的家庭及家庭代際關係更趨複雜，給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傳統家庭關係帶來挑戰。正如費孝通所言，社會曾把親子關係密切地加上種種牽連，但是文化的不斷變化，使得加上的牽連又得用血淚來絲絲切斷(費孝通，1999)。這種「世代之間的隔膜」不僅是現實和理想之間的衝突，也是生物和社會衝突的一個反映。本研究從代際合作育兒媒介實踐話題出發，印證了「雙重撫育—反哺」模式是認識和分析數字媒介時代家庭代際關係的基本邏輯，代際情感聯繫的價值也始終是代際關係中的核心要素。此外，在數字媒介參與之下，以合作育兒為代表的生活議題有助於家庭倫理關係的重整，形成契洽共鳴的代際關係，在家庭功能聚合的基礎上實現代際價值差異和家庭情感的融通。

本研究的局限在於僅聚焦數字媒介在城市中產階層家庭的婆媳合作育兒參與，未包括農村地域及其他社會階層，無法從比較框架視野下進行分析。此外，男性在合作育兒的實踐中如何提供更好的助力，以及網路空間中婆婆帶孩子的污名化問題也是一項重要議題，都有待深入探究。總之，現代代際互動是一個充滿動態性和靈活性的過程，婆媳合作育兒的媒介實踐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視角，網絡技術的加速發展、「三孩」政策出台和「科學育兒」蔚然成風的背景之下，如何促使數字媒介構建和諧的媒介融合型家庭有待繼續挖掘。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卜娜娜、衛小將(2020)。〈勞累、拉扯與孤單：「老漂」母親的母職實踐及回應〉。《婦女研究論叢》，第6期，頁56–67。
- Bu Nana, Wei Xiaojiang (2020). Laolei, lache yu gudan: “Laopiao” muqin de muzhi shijian ji huiying. *Funü yanjiu luncong*, 6, 56–67.
- 毛新青(2008)。〈對現代家庭婆媳關係的思考〉。《山西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1期，頁88–90。
- Mao Xinqing (2008). Dui xiandai jiating poxi guanxi de sikao. *Shanxi qingnian guanli ganbu xueyuan xuebao*, 1, 88–90.
- 石金群(2016)。〈轉型期家庭代際關係流變：機制、邏輯與張力〉。《社會學研究》，第6期，頁191–213、245。

- Shi Jinqun (2016). Zhuanxing qi jiating daiji guanxi liubian: Jizhi, luoji yu zhangli. *Shehui xue yanjiu*, 6, 191–213, 245.
- 自國天然 (2019)。〈日常生活與數字媒介：一種實踐分析取向的出現〉。《新聞界》，第6期，頁77–86。
- Ziguotianran (2019). Richang shenghuo yu shuzi meijie: Yizhong shijian fenxi quxiang de chuxian. *Xinwenjie*, 6, 77–86.
- 何志武、吳瑤 (2015)。〈媒介情境論視角下新媒體對家庭互動的影響〉。《編輯之友》，第9期，頁9–14。
- He Zhiwu, Wu Yao (2015). Meijie qingjinglun shijiao xia xinmeiti dui jiating hudong de yingxiang. *Bianji zhi you*, 9, 9–14.
- 吳帆、尹新瑞 (2020)。〈中國三代家庭代際關係的新動態：兼論人口動力學因素的影響〉。《人口學刊》，第42期，頁5–18。
- Wu Fan, Yin Xinrui (2020). Zhongguo sandai jiating daiji guanxi de xin dongtai: Jianlun renkou donglixue yinsu de yingxiang. *Renkou xuekan*, 42, 5–18.
- 李新華 (1989)。〈第三代與新生代——關於「代際理論」的手記之二〉。《當代青年研究》，第1期，頁30–35。
- Li Xinhua (1989). Disandai yu xinshengdai——Guanyu “daiji lilun” de shouji zhi er. *Dangdai qingnian yanjiu*, 1, 30–35.
- 李強 (2001)。〈關於中產階級和中間階層〉。《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2期，頁17–20。
- Li Qiang (2001). Guanyu zhongchan jieji he zhongjian jieche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xuebao*, 2, 17–20.
- 李春玲 (2013)。〈如何定義中國中產階級：劃分中國中產階級的三個標準〉。《學海》，第3期，頁62–71。
- Li Chunling (2013). Ruhe dingyi Zhongguo zhongchan jieji: Huafen Zhongguo zhongchan jieji de sange biao zhun. *Xuehai*, 3, 62–71.
- 李一 (2018)。〈中產階級家庭參加輔導班教養實踐分析〉。《青年研究》，第5期，頁19–26、94–95。
- Li Yi (2018). Zhongchan jiecheng jiating canjia fudaoban jiaoyang shijian fenxi. *Qingnian yanjiu*, 5, 19–26, 94–95.
- 李芳英 (2019)。〈精神負載：母職實踐過程中的性別關係再生產〉。《人口與社會》，第1期，頁64–73。
- Li Fangying (2019). Jingshen fuzai: Muzhi shijian guocheng zhong de xingbie guanxi zai shengchan. *Renkou yu shehui*, 1, 64–73.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 李碩(2019)。<〈代際撫養合作關係中女性家庭權利的嬗變——基於婚姻法中「家」的分析〉。《理論與改革》，第6期，頁167-180。
- Li Shuo (2019). Daiji fuyang hezuo guanxi zhong nüxing jiating quanli de shanbian——Jiyu hunyinfa zhong “jia” de fenxi. *Lilun yu gaige*, 6, 167-180.
- 李興睿、馮劍俠(2019)。<〈後喻文化語境下代際合作育兒如何實現良性互動？——基於科學育兒知識的學習與實踐分析〉。《山東女子學院學報》，第6期，頁90-96。
- Li Xingrui, Feng Jianxia (2019). Houyu wenhua yujing xia daiji hezuo yuer ruhe shixian liangxing hudong?——Jiyu kexue yuer zhishi de xuexi yu shijian fenxi. *Shandong nüzi xueyuan xuebao*, 6, 90-96.
- 汪永濤(2020)。<〈轉型期城市家庭的代際合作育兒〉。《社會學評論》，第8期，頁85-97。
- Wang Yongtao (2020). Zhuanxingqi chengshi jiating de daiji hezuo yuer. *Shehuixue pinglun*, 8, 85-97.
- 汪建華(2019)。<〈小型化還是核心化？——新中國70年家庭結構變遷〉。《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第2期，頁118-130、144。
- Wang Jianhua (2019). Xiaoxinghua haishi hexinhua?——Xin Zhongguo 70 nian jiating jigou bianqian. *Zhongguo shehui kexue pingjia*, 2, 118-130, 144.
- 沈奕斐(2009)。<〈「後父權制時代」的中國——城市家庭內部權力關係變遷與社會〉。《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頁43-50。
- Shen Yifei (2013). “Hou fuquanzhi shidai” de Zhongguo——Chengshi jiating neibu quanli guanxi bianqian yu shehui. *Guangxi minzu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6, 43-50.
- 肖索未(2014)。<〈「嚴母慈祖」：兒童撫育中的代際合作與權力關係〉。《社會學研究》，第6期，頁148-171、244-245。
- Xiao Suowei (2014). “Yanmu cizu”: Ertong fuyu zhong de daiji hezuo yu quanli guanxi. *Shehuixue yanjiu*, 6, 148-171, 244-245.
- 邢淑芬、孫琳、王媛、王爭艷(2012)。<〈我國社會變遷背景下兒童養育行為的代際差異〉。《教育研究》，第11期，頁122-127。
- Xing Shufen, Sun Lin, Wang Yuan, Wang Zhengyan (2012). Woguo shehui bianqian beijing xia ertong yangyu xingwei de daiji chayi. *Jiaoyu yanjiu*, 11, 122-127.
- 周裕瓊(2014)。<〈數字代溝與文化反哺：對家庭內「靜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第2期，頁117-123。

- Zhou Yuqiong (2014). Shuzi daigou yu wenhua fanbu: Dui jiating nei “jingqiaoqiao de geming” de lianghua kaocha. *Xiandai chuanbo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xuebao)*, 2, 117–123.
- 周裕瓊、丁海瓊 (2020)。〈中國家庭三代數字反哺現狀及影響因素研究〉。《國際新聞界》，第3期，頁6–31。
- Zhou Yuqiong, Ding Haiqiong (2020). Zhongguo jiating sandai shuzi fanbu xianzhuang ji yingxiang yinsu yanjiu. *Guoji xinwenjie*, 3, 6–31.
- 林志忠 (2002)。〈美國隔代教養家庭現況及支持方案之分析〉。《中國家庭教育》，第2期，頁45–47。
- Lin Zhizhong (2002). Meiguo gedai jiaoyang jiating xiankuang ji zhichi fangan zhi fenxi. *Zhongguo jiating jiaoyu*, 2, 45–47.
- 金一虹、楊笛 (2015)。〈教育「拼媽」：「家長主義」的盛行與母職再造〉。《南京社會科學》，第2期，頁61–67。
- Jin Yihong, Yang Di (2015). Jiaoyu “pinma”: “Jiazhang zhuyi” de shengxing yu muzhi zaizao. *Nanjing shehui kexue*, 2, 61–67.
- 俞峰 (2021)。《代際學習視角下祖輩與父輩合作育兒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Yu Feng (2021). *Daiji xuexi shijiao xia zubei yu fubei hezuo yuer yanjiu*. Shanghai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哈特穆特·羅薩 (2017)。《新異化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Rosa, H. [2013]. *Beschleunigung und entfremdung: Entwurf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spätmoderner zeitlichkeit*. Berlin: Suhrkamp Verlag AG.)
- Hatemute Luosa (2017). *Xin yihua de dansheng*.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Rosa, H. [2013]. *Beschleunigung und entfremdung: Entwurf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spätmoderner zeitlichkeit*. Berlin: Suhrkamp Verlag AG.)
- 姚俊 (2012)。〈「臨時主幹家庭」：城市家庭結構的變動與策略化——基於N市個案資料的分析〉。《青年研究》，第3期，頁85–93、96。
- Yao Jun (2012). “Linshi zhugan jiating”: Chengshi jiating jiegou de biandong yu celuehua——Jiyu N shi gean ziliao de fenxi. *Qingnian yanjiu*, 3, 85–93, 96.
- 段岩娜 (2021)。〈認同、反思與游離：城市中產家庭「密集型育兒」的類型化分析〉。《雲南社會科學》，第6期，頁142–148。
- Duan Yanna (2021). Rentong, fansi yu youli: Chengshi zhongchan jiating “mijixing yuer” de leixinghua fenxi. *Yunnan shehui kexue*, 6, 142–148.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 徐依婷(2020)。〈「喪偶式育兒」：城市新生代母親的母職困境及形成機制〉。
《寧夏社會科學》，第6期，頁136-143。
- Xu Yiting (2020). “Sangoushi yuer”: Chengshi xinshengdai muqin de muzhi
kunjing ji xingcheng jizhi. *Ningxia shehui kexue*, 6, 136-143.
- 袁佳黎、劉飛、張文宏(2022)。〈孝道觀念、代際支持與青年群體贍養行為的
變遷：2006-2017〉。《中國青年研究》，第1期，頁93-103。
- Yuan Jiali, Liu Fei, Zhang Wenhong (2006). Xiaodao guannian, daiji zhichi yu
qingnian qunti shanyang xingwei de bianqian: 2006-2017. *Zhongguo qingnian
yanjiu*, 1, 93-103.
- 馬丹丹(2018)。〈「中國中產階級實證研究的對話與碰撞」會議綜述〉。《青年學
報》，第1期，頁107-112。
- Ma Dandan (2018). “Zhongguo zhongchan jieji shizheng yanjiu de duihua yu
pengzhuang” huiyi zongshu. *Qingnian xuebao*, 1, 107-112.
- 馬春華、石金群、李銀河、王震宇、唐燦(2011)。〈中國城市家庭變遷的趨勢
和最新發現〉。《社會學研究》，第2期，頁182-216、246。
- Ma Chunhua, Shi Jinqun, Li Yinhe, Wang Zhenyu, Tang Can (2011). Zhongguo
chengshi jiating bianqian de qushi he zuixin faxian. *Shehuixue yanjiu*, 2, 182-
216, 246.
- 張杰(2015)。《生命歷程視角下的城市家庭育兒的代際差異分析》。哈爾濱工
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Zhang Jie (2015). *Shengming licheng shijiao xia de chengshi jiating yuer de daiji
chayi fenxi*. Haerbin gongcheng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張楊波(2018)。〈代際衝突與合作——幼兒家庭照料類型探析〉。《學術論
壇》，第5期，頁125-133。
- Zhang Yangbo (2018). Daiji chongtu yu hezuo——Youer jiating zhaoliao leixing
tanxi. *Xueshu luntan*, 5, 125-133.
- 張翼(2012)。〈中國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與老年空巢化〉。《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研究》，第6期，頁87-94。
- Zhang Yi (2012). Zhongguo jiating de xiaoxinghua, hexinhua yu laonian
kongchaohua. *Zhongguo tese shehui zhuyi yanjiu*, 6, 87-94.
- 張蘋、胡琪(2016)。〈在滬「老漂族」的社會適應問題及其對策研究〉。《城市觀
察》，第3期，頁105-114。
- Zhang Ping, Hu Qi (2016). Zaihu “laopiao zu” de shehui shiying wenti ji qi duice
yanjiu. *Chengshi guancha*, 3, 105-114.

- 陳向明 (2000)。《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 Chen Xiangming (2000). *Zhi de yanjiu fangfa yu shehui kexue yanjiu*. Beijing: Jiaoyu kexue chubanshe.
- 陳向明 (2001)。《教師如何做質的研究》。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 Chen Xiangming (2001). *Jiaoshi ruhe zuo zhi de yanjiu*. Beijing: Jiaoyu kexue chubanshe.
- 陳滔、卿石松 (2019)。〈中國孝道觀念的代際傳遞效應〉。《人口與經濟》，第2期，頁55–67。
- Chen Tao, Qing Shisong (2019). *Zhongguo xiaodao guannian de daiji chuandi xiaoying*. *Renkou yu jingji*, 2, 55–67.
- 陳蒙 (2018)。〈城市中產階層女性的理想母職敘事——一項基於上海家庭的質性研究〉。《婦女研究論叢》，第2期，頁55–66。
- Chen Meng (2018). *Chengshi zhongchan jiecheng nüxing de lixiang muzhi xushi*——Yixiang jiyu Shanghai jiating de zhixing yanjiu. *Funü yanjiu luncong*, 2, 55–66.
- 陶艷蘭 (2011)。〈代際互惠還是福利不足？——城市雙職工家庭家務勞動中的代際交換與社會性別〉。《婦女研究論叢》，第4期，頁13–19。
- Tao Yanlan (2011). *Daiji huhui haishi fuli buzhu?*——Chengshi shuang zhigong jiating jiaowu laodong zhong de daiji jiaohuan yu shehui xingbie. *Funü yanjiu luncong*, 4, 13–19.
- 陶艷蘭 (2018)。〈養育快樂的孩子——流行育兒雜誌中親職話語的愛與迷思〉。《婦女研究論叢》，第2期，頁31–45。
- Tao Yanlan (2018). *Yangyu kuaile de haizi*——Liuxing yuer zazhi zhong qinzi huayu de ai yu misi. *Funü yanjiu luncong*, 2, 31–45.
- 陶艷蘭、風笑天 (2016)。〈多面性的母親：流行育兒雜誌與母親角色的社會建構〉。《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期，頁120–125。
- Tao Yanlan, Feng Xiaotian (2016). *Duomianxing de muqin: Liuxing yuer zazhi yu muqin juese de shehui jiangou*. *Zhongnan minzu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ban)*, 5, 120–125.
- 費孝通 (1998)。《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Fei Xiaotong (1998). *Xiangtu Zhongguo Shengyu zhidu*.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費孝通 (1999)。《生育制度》。北京：商務印書館。
- Fei Xiaotong (1999). *Shengyu zhid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 楊可(2018)。〈母職的經紀人化——教育市場化背景下的母職變遷〉。《婦女研究論叢》，第2期，頁79-90。
- Yang Ke (2018). Muzhi de jingjiren hua——Jiaoyu shichanghua Beijing xia de muzhi bianqian. *Funü yanjiu luncong*, 2, 79-90.
- 趙光偉(2004)。〈隔代教育淺析〉。《決策探索》，第10期，頁85。
- Zhao Guangwei (2004). Gedai jiaoyu qianxi. *Juece tansuo*, 10, 85.
- 劉亞娜(2016)。〈社區視角下老漂族社會融入困境及對策——基於北京社區「北漂老人」的質性研究〉。《社會保障研究》，第4期，頁34-43。
- Liu Yana (2016). Shequ shijiao xia laopiao zu shehui rongru kunjing ji duice——Jiyu Beijing shequ “beipiao laoren” de zhixing yanjiu. *Shehui baozhang yanjiu*, 4, 34-43.
- 劉彩玲(2006)。〈婆媳關係的倫理調適〉。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Liu Cailing (2006). *Poxi guanxi de lunli tiaoshi*. Hunan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劉彩玲、李桂梅(2005)。〈現代家庭婆媳關係的理性探索與關懷〉。《株洲工學院學報》，第5期，頁57-59。
- Liu Cailing, Li Guimei (2005). Xiandai jiating poxi guanxi de lixing tansuo yu guanhuai. *Zhuzhou gongxueyuan xuebao*, 5, 57-59.
- 劉嘉偉(2018)。〈隔代撫育：城市家庭代際關係研究〉。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Liu Jiawei (2018). *Gedai fuyu: Chengshi jiating daiji guanxi yanjiu*. Wuh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樂儷雲(2009)。〈變遷中的中國家庭與兒童看護的社會學考察〉。《湖北社會科學》，第8期，頁50-52。
- Luan Liyun (2009). Bianqian zhong de Zhongguo jiating yu ertong kanhu de shehuixue kaocha. *Hubei shehui kexue*, 8, 50-52.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Chae, J. (2015). Am I a better mother than you? Media and 21st-century motherhood in the context of the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4), 503-525.
- De Bary, A. (1879). *Die erscheinung der symbiose: Vortrag gehalten auf der versammlung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 aerzte zu cassel*. Verlag von Karl J. Trubner.
- Kinderlerer, J., Dabrock, P., Haker, H., & Nys, H. (2012, February 22). *Ethic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No. 26). Retrieved Aug 10, 2022, from <https://data.europa.eu/doi/10.2796/13541>.

「共生」與「契洽」

Park, R. E., & Burgess, E. W. (1921).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rensky, M. (2001).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part 2: Do they really think
differently?. *On the Horizon*, 9(6), 1–6.

本文引用格式

安利利、李美儀 (2023)。〈「共生」與「契洽」：城市中產家庭婆媳合作育兒的媒介實踐〉。《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64 期，頁 129–159。